

許孟瀛譯述

演變中之大學教育

商務印書館印行

Adolf Lowe 原著

許孟瀛譯述

演變中之大學教育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初版

(*33253 滬報紙)

演變中之大學教育一冊

Universities in Transformation

定價 國幣 壹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Adolf Lowe

譯述者

許孟瀛

發行人

王雲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著者序言

這本書並不是關於英國大學生活上種種問題之系統的或詳盡的說明。在這本書裏面，祇希望把作者個人在一個現代英國大學服務七年當中所孕育的幾點觀念，加以闡述罷了。

在說明我個人的印像當中，我很受克拉克（E. Clarke）教授著作的影響（註一）。同時關於現代社會之演化與結構，我又深受曼罕姆（K. Mannheim）教授的啓示（註二）。搜集一種間接的知識，困難尤多。所以即令我能夠非常慎審的從事，我明知還是會有種種限度或遺漏的地方。我個人不曾親身經驗過英國大學本科學生的生活，這是抽象的理論所不能補償的缺陷。但是就另一方面言，在受過一種迥然不同的社會與教育傳統所陶鑄的人，來觀察目前的英國大學制度，他的見解對於本國的觀察家，並不是毫無意義的。這種異邦人的看法，至少可以使本國觀察家的態度更加慎重。

書內一部分的分析，特別是關於職業教育的幾段，是以廣義的文類科系為限。至於自然科學，或技術學方面的問題，作者自覺無資格發表意見。雖然，關於普通教育的討論仍是指一切科系的學生而言的。

作者在本書內所注意的差不多完全限於大學之教育的（譯者按原文為 educational，乃對

「研究的」research 而言）工作，關於大學的另一種責任（即研究的場所）方面所發生的問題，則無暇論及。因為個人覺得這一方面需要另作一番考察，同時在這方面的改革，並不是亟需的工作。我們甚至可以說大學在教育方面所發生的困難，一部分是因為在某幾方面過於着重研究的工作，其實在這幾方面，現有知識和材料的運用同另開闢新的研究是一樣重要的。

註一：克拉克：教育與社會變遷（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1940）

註二：曼罕姆：意識形態學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 London, 1936）

目次

著者序言

第一章 社會學的觀點

第二章 英國大學的偉大時代

一、綜合的教育

二、豐富的教育

三、社會背景乃教育的因子

第三章 大學在各時代的演變

一、變遷的背景

二、傾向專門化的趨勢

三、文化教育與道德教育的厄運

四、教學和考試的方法

第四章

一個可能的辦法綱要

一、新社會

二、職業教育·····	一八
三、一個新的文化教育·····	一九
1. 現代文化的解釋·····	二一
2. 繩驗之訓練·····	二三
3. 標準之教學——牛津大學的「現代主科制」·····	二四
4. 道德教育·····	二七
5. 現代大學的社會問題·····	三〇
第五章 新的大學教育之繼續·····	三三
一、榮譽考試制·····	三三
二、人本主義的專門化·····	三四
三、幾個形式方面的先決條件·····	三六
第六章 結論：怎樣開始？·····	四〇
譯後·····	四二

演變中之大學教育

第一章 社會學的觀點

以下的討論，我要採取一種社會的教育觀點，並且相信克拉克教授所說：「教育理論與實際同現社會秩序之間具有連帶性」。前幾年牛津大學舉行教會，社團與國家討論會（註），在該會的教育報告書上，也有這種同樣觀念的明白表示，認為教育是一種社會歷程，社會藉着這個歷程，希望把牠的文化（包括生活上一定要遵守的一切標準）傳給社團之內的每個分子。這種顯然的說明，既不同於宗教改革時代的古典學說，把教育認成個人天賦性質之開展的歷程，又不同於民主國家應用過於簡單的宣傳辦法——流行的標語，來攻擊集體主義的教育。現在最要緊的我們可以先看一看這種觀點所反對的是甚麼。這種觀點反對關於教育原理與教育價值的任何「相對主義」。因為這種主義對於人本主義之擁護與集體主義之反抗是不加區別的。然而這種觀點相信：除非我們能參照教育制度的社會秩序背景，我們對於教育制度就不能有真正的欣賞或批評，因為教育是為一種社會目的而服務，即令教員同學生自己並不覺得這

種事實，而僅僅認為教育的接觸不過是一種無所爲的自然的活動。實際上各級教育——從小學教育到大學教育，都有偉大的社會力量在發生作用。依照某種型式來範鑄正在發育的個體，以期造成一種固定的人類範型。一個自由的社會所以不同於專制的社會，就在乎前者使個體對於目前的範型能有更大範圍的改變及發展之自由。在這種客觀的自由範圍之內（並非任何主觀的自由經驗），我們要注意到教育上真正人本主義的特質。對於現存教育制度毫不思索的接受甚至熱誠的擁護，其結果和集體主義的統制正相同，這在蘇聯和德國的經驗可以告訴我們。最要緊的乃是我們要問現在的人類範型是靜的還是動的？或者照克拉克的說法，教育制度是否具有充分的活動性，能便而且鼓勵現存的範型有更進步的發展。

這裏所謂「動的」的範型，含有兩層意思。一方面承認人類歷史之「未窮盡」，並指出文化演進的重要意義；在另一方面又有一種特別重大的意義，在目前尤其值得注意，即是認識社會與教育中間的互相依賴性，並非是教育家對於某一時代實際的概念和標準毫不批評的接受。形成一個社會的外表結構常常多少同它可能的理想是有出入的。我們認為教育政策應該用社會秩序的理想方面（不是社會秩序之現實方面），來影響社會上的領導範型。

根據此種觀點，我們必須把大學看作一種社會的機關。這種看法並不反對大學同時也可以爲私人的目的而盡其啓蒙與訓練的責任，這種責任雖同大學的社會目的沒有直接的關係，然而也是十分合理的。不過一個大學制度之成功，最後還是要靠它的社會成績來測量的。也就是說要

看它對於它的下列三種工作有如何的貢獻：

(1) 普通或文化的教育，使我們對於自然及社會能有理性的和直觀的瞭解；換言之，對於世界之意義，組織與演化，有一種整個的解釋。

(2) 職業的或專門的教育，給予學生某項專門職業的訓練，使他們在分工的社會當中，能夠有知識方面的適應。

(3) 道德教育，即關於學生的意志指導，目的在依照真正理想的社會標準來軌範他們的行為。

註：見教會對於自身業務的檢討 (The Churches Survey Their Task, London, 1937,

P.103)

第二章 英國大學的偉大時代

我們研究每一種現行制度，必須首先承認英國大學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所表現的偉大的教育成績。當時英國大學確切能作到上述的三種工作，而且使學生能受到真正人本主義的精神陶冶。以下我要一方面簡單分析這種成功的理由，同時表明現在某幾點失敗的原因。

(一) 綜合的教育

在上次大戰前五十年當中，英國大學首先對於文化的和職業的教育之間完成一種美滿的綜合。最好的表證，就是牛津大學實行的「主科制」(Greats)。

克拉克教授在「英國教育之歷史背景」一書裏說，曾明白敘述自十八世紀以來，古典人本主義教育怎樣逐漸發展而成爲職業的訓練——治者的職業。因爲克氏不曾把十九世紀盛行的治者之特殊風格，詳細描寫，所以如果我們能先有一個某種社會的輪廓，以及對於適合此種社會之治者的風格先有一種瞭解，或者可以補充克氏的敘述，並闡明大學教育之社會學的基礎。

我們常稱十九世紀的英國是一種「自由的社會」。如果我們想一想當時的經濟組織與政治制度，就知道這種說法確有豐富的含義。的確，自由的社會秩序之先決條件——即最小限度的中

央管理，算是實現了。而且把集團生活完全聽諸個體活動的嘗試與錯誤。然而我們如果把英國的自由主義同原子論者的社會結構等量齊觀，也是錯誤的。一個觀察家把這個時期的英國歷史同歐洲其他大國來比較，足使他驚異的並不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而是自動組織各種團體的普遍趨勢。自政黨以至教堂的聚會，公共的生活實際上是受着一切自治團體的支配。這種團體一方面是一種自然的生長，同時又合乎民主的領袖原理。按其領袖取得地位的方法，便可以看出這種組織是民主的；因為領袖的地位，全憑訴諸他的擁護者之理性與道德的意識來爭取大多數的承認。領袖地位的取得，雖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然而他並不是完全不能用相當獨裁的方式來行使他的權力。他可以放心大胆地這樣作，祇要他能按照民主的手續，不辜負選民對他的信任。

古代的大學，正是培育此種治者的理想場所。特別是「主科制」，就是代表政治與文化的綜合觀點來訓練社會所需要的知識才能。不錯，當時的解釋所根據的文明是一種過去的文明，這種文明雖然同十九世紀有長久時間的隔離，然而却和十九世紀的文明有兩個共同的重要特質：一方面這兩種文明的推動力都是個體之理性的與道德的自主；另一方面，這兩種文明所基礎的整個社會秩序，都是由大多數公認的少數特權階級的態度與行為。

(二) 豐富的教育

一件有趣的事實，就是在這種教育裏面，職業的 (Vocational) 原素與文化的 (cultural)

原素是互相交織的。祇有牛津的主科制纔能充分表現此種精神，同時劍橋大學的古典教育比較富於「科學」的色彩，而且不如在牛津大學佔有重要的地位。至於何以在結果方面仍極其相似，下面預備再說出他的理由。但是最要緊的，我們要注意這種教育的共同原素決不是「形式的」——即並不僅是關於方法。這種教育很清楚的是一種豐富的教育——即是從歷史文學與哲學三方面結合而成的一種確定的內容。在這種古代文明裏面所包含的幾種價值就是：理性的與道德的自主，希臘的真善美三者之調和，以及在相當限度內又容納了雅典皮利克（Pericles）時代的民主概念。在這種意義下，古典的教育並不反對灌輸式的訓練，不過這種訓練的工作，因為假定的價值與經驗的價值之符合，所以很容易進行。

（三）社會背景乃教育的因子

於此我們要談到此種制度成功的第三個或者最重要的一個因子。這個因子僅是間接地同大學本身發生關係，同時和其他的教育機關及時代精神都有關連。前面我們說過，大學產生了當時自由的英國所需要的人類範型。現在我們更可以說滲入於當時公共生活之中的精神其本身就是最大的教育力量。不僅是當時主要的學校教育活動和大學受着同一原理的指導，連一切非正式的教育組織，如家庭生活以及統制家庭生活的禮則，倫理教會的宗教及社會活動，詩歌小說，甚至社會批評家迭更斯（Dickens）的言論，都代表同樣的價值，影響着正在發育的心理。

這裏我們必須找到理由來解釋爲甚麼用牛津的傳統所造成的教育結果，在富於科學色彩的劍橋也會有類似的教育成績，連當時幾個偏重技術的新式大學在某種限度內，也有類似的教育結果。無論在知識或道德方面，大學不過是把一般在受大學教育以前已經受日常生活與傳統所影響的態度再加以發展罷了。

在古代的大學裏，各學院的社會生活卽是用此種同樣的精神來完成了知識以外的教育。學生們在這種整齊的社會裏面獲得了生活的經驗，雖然這裏所謂整齊的卽是指超越一般人民之上的少數貴族子弟而言。各種遊戲與身體訓練刺激學生對於合作事業的認識以及團體生活的適應。這種生活雖是一種超然孤立的，然而因爲充滿了有計劃而且切實的知識和道德的經驗，所以實際却是預備更廣大的生活之縮影。無論如何，學生畢業以後的實際生活證明了這種教育的「真理」。當時關於思想與評價之異常的統一，不過是反映着英國社會上領導階級所經驗的時代之協調。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不論在國外或國內的政治方面，都不曾發生根本的問題，足以嚴重威脅當時進步的信仰和基本的團體精神。所謂「君子之風」——當時對於英國治者的雅號，乃是真正的教育理想，這種理想根本是文化的職業的和道德的結合，以適應時代精神和需要。

第三章 各時代中的大學

我已經對於光榮的過去，作了詳細的討論，目的在追究兩件史實，這種史實對於我們瞭解目前的事實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們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決定一種大學制度之成功或失敗，實在有許多而且廣泛的因子。有許多因子不是發生於教育政策之影響以外的種種社會生活。所以如果大學制度和社會秩序失掉平衡，單憑教育本身的方法，不能建設一種新的平衡。在另一方面，我們要知道傳統的英國大學制度本身原來並沒有甚麼錯誤。前代所發生的困難並不是因為這種傳統制度本身含有天然的弱點，而是由於一般社會背景發生了變遷。我們的困難正如富萊茲（Flecker）所說的是「社會的落伍」。就是說，大學在許多方面對於它的社會環境中的重大變遷，沒有澈底的認識。

（一）變遷的背景

關於這種社會變遷的本身，現在不必多所討論。這種變遷同樣使我們在政治的與經濟的領域之內碰到了許多困難。在各方面都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十九世紀英國社會基礎之物質與精神的條件是很特殊的。而且是歷史上所必須的過渡。政治上的穩定遂使政府集權的干涉減至最少

程度。國家富力的不斷增強乃消除了階級鬥爭，同時世界邊疆的開闢，又爲許多互相衝突的個體與團體創造了無數的出路。這三種因子合起來，遂給自由的民主主義一種時間上的條件，亦即緩慢的變遷，使我們對於一切理論的與實際的問題都採取一種經驗主義者的態度。忍耐的精神即基礎於這種態度之上，亦即此種精神使一種文化傳統從中世紀末年以來一直有不間的繼續生存，而且在一種功利主義與唯理主義的時代中保持了一種世俗化的基督倫理學。

此刻來詳細討論社會變遷的象徵和原因，未免浪費時間。孤立之結束，不僅使外交政策獲得重要的地位，並且遠在這次大戰爆發之前，已經犧牲了自治與國會的手續而造成一種全權的政府機構。向外發展的停頓，已經產生許多困苦的区域，而且使勞動階級陷於具有危險性的獲業與失業的劃分，工業界技術的進步也產生了這種危險的趨勢。

也許有人要補充一句說這種變遷之緩慢，實在超過我們普通的想像，考查過去，我們可以發現二十世紀的頭十年，我們現在許多的困難已經開始了，尤其是根據日漸專家化與技術化的原則而重新改組的商業生活與行政，表示得更清楚。但是從一九一八年以來，這種趨勢才真正得到助力，而在此次大戰當中，不得不有更迅速的發展。

大學對於這種新的社會情境會有怎樣的反應？這種新社會情境主要是在三方面影響了大學的傳統組織：對於職業專家愈感需要，學生當中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階層，與夫大學裏面多數學生的教育背景與一般態度有了一種變化。

(二) 傾向專門化的趨勢

高等職業之日趨專門化，乃是我們的技術文明之必然結果。雖然理論上那些大學校還承認這種發展，可是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它們也就日漸的讓步了。有人就以爲這正是表示停止不進的舊人文主義者的理想與客觀事實顯然有極大的差別。至於在一般現代的大學裏面，這種情形更其明顯無需討論。但是在一般古老的大學裏面，科學的精神也在日漸形成一種智識的教育。富萊茲氏比較牛津和劍橋的區別，他的結論認爲這種區別是一種價值智識與精確知識的區別。這個說法也許有批評的餘地，但是在一定限度內，我們可以說在過去的三十年當中，劍橋大學在英國大學制度上所獲得的重要地位，正同十九世紀後半葉牛津大學所有的重要地位遙遙相對。

大學教育之職業性的轉變，更因爲學生中間社會階層之逐漸變遷而加強。中下階級和高級勞働階級之崛起，以及在中小學教育上相應而起的變遷，打破了上層階級在大學裏面的壟斷。這是因爲：第一，有許多的地方大學之設立，第二，隨之又有各種獎學金和學校津貼（*Scholarship*）制度之創立。結果，在今天差不多有半數學生是整個的或部份的靠着公費而生活。過去二十年當中，經濟的不穩定，除了影響到一些職業，必然使大多數學生的興趣傾向於他們所受的教育之功利的價值。換句話說，大學已經不是在對一般優閒階級施行教育了，大學根本是